

如果小津能活过整个 20 世纪

姜建强

时间是从他的指尖滑过

“无所事事。完全无所事事。洗澡、喝酒、睡觉、听广播里的相扑比赛、喝酒、睡觉。”

写下这些文字，他自己也不知道，距永远离开这个世界只有2年多些的时间。问题是这也太无聊了。除了喝酒就是睡觉，除了睡觉就是喝酒。但他会这样与你说：“人生中无聊是必然的，你说对吧？”

仅看这些，你恐怕怎么也不会相信这是日本世界级大导演，在自己的日记里留下的文字。这

位大导演就是小津安二郎。上述的文字，散见于1961年11月18日和11月11日的日记。

在东京抗疫的日子里，读完最厚最大的一本书就是《小津安二郎全日记》（上海译文出版社，周以量译）。800多页，从1933年到1963年。这些文字，看似是能简则简的漫不经心，但当完整读完这些文字，再思考他的电影，觉得非常有趣。自己是个感官先行主义者（如他喜欢品尝各种美食），但在他的镜头里绝无感官刺激。自己没有家庭，但他的电影主题都是家庭人伦。自己喜欢的女人不去表白，却用父爱如山隐喻。不过读完全日记，让人终于明白的一件事是：如果说黑泽明代表的是日本

喧闹（武士）文化，那么小津代表的是日本静谧（家庭）文化。黑泽明的刚愎自用在小津身上找不到，小津的一意孤行在黑泽明身上也难寻觅。从内在气质看，小津要比黑泽明绅士得多优雅得多。黑泽明能说出“狗娘养的”骂人话，这是小津怎么也学不来的。“吃柿饼，落日红彤彤。”喜欢写俳句的小津，时间是从他的指尖滑过，生命是从他的意识掠过。波澜不惊一切，但一切皆在波澜中。

小津的灵魂深处，始终有个30岁时的“设问”：“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孩子讲童话故事呢？”（1933/10/30日记）是。为什么呢？仅仅是为了回答桃太郎在什么地方？在鬼之岛被



《秋刀鱼之味》

杀的鬼是赤鬼还是青鬼？穿和服的麻雀又在哪里吗？好像又不是。恰恰是这个“又不是”，触发了小津如何在电影中构画永恒的人伦亲情的奇想。用他的日记文字表述就是“一觉醒来，夕阳已西沉，余晖洒落在庭院里”。这就如同寺院青苔上的茶花，京都山脉的紫色，一只蓝色的瓷杯，在观念的潮汐起落中，

我们如何观赏其永恒一样。

1953年的《东京物语》，是小津电影的经典文本。战后日本的家庭亲情，那温润柔软的一块面纱，还能遮盖人伦、情分、忠孝和责任吗？渐渐老去的父母总是活在理所当然的与子女的连带中，想用过去的时间维系曾经的在。

（下转6版）➔

（上接4版）

从传播学和心理学角度指出恐慌是产生谣言的温床，肯定了清政府通过媒体公布防疫章程、普及防疫知识、及时公布每天疫势情况，有力遏止了谣言的传播，同时传播了科学防疫的有效性。学者郭剑鸣考察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运用政治学理论指出，建设一种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救灾防疫，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分工互补、多层次分担公共危机风险的机制，是现代灾疫政治的当务之急。同时，要将公共危机的挑战成功地转化为整合民心的机遇，形成健康的公共危机治理文化。

另一方面，关于近代防疫措施的研究，绝大部分集中在西医领域。中医学者吴文清汇总近代百年时间内传统中医运用中医防治手段和方法，通过设立特殊的防治机构与西医联手抗疫的史实，为中医防疫保留下了重要的史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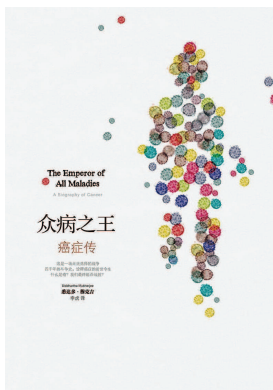
纵观这一时期的疾病史研究成果，博硕士论文数量突出，显示出疾病史研究对年轻学者较强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可能囿于视野和素养，以年轻学者为主的研究群体往往止步于勾勒现代国家防疫体系的建成，忽略了反思防疫体系运作背后更为深层的制度或文化因素，如防疫与全球化、防疫与生态、防疫与经济、防疫与中医、防疫与日常生活、防疫与身体规训等。另一方面，和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肆虐不同，20世纪下半叶后，对社会造成较

大影响的往往是特殊机缘造成的急性或慢性传染病，诸如肺结核、血吸虫病、流行性肝炎、流行性感、艾滋病等，显然，历史学界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传染病和防疫工作的历史梳理还有待加强。

慢性疾病等现实医学热点是疾病史研究的未来

纵观欧美疾病史研究的兴起，是伴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疾病的社会问题日渐凸显，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后现代史学等社会思潮的日渐兴起，促使包括疾病史在内的医疗史研究逐渐成为西方主流史学的一部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新的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和医疗形式的更新进一步拓展了西方疾病史的研究领域。

慢性疾病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面临的主要医学热点。疾病史研究的方向，没有脱离疾病本身发展的特征和规律。从肺结核史、艾滋病史、糖尿病史、癌症史研究，到癫痫、抑郁症、厌食症等较为前沿的精神疾病史研究，陆续被纳入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的范畴。以癌症史为例，作为慢性疾病代表的癌症，在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死亡原因之一。西方社会围绕癌症，在疾病史领域已有大量探索。仅就近二十年而言，西方以癌症为对象，研究这种疾病所引发的国家、社会的应对，即癌



《众病之王：癌症传》

症的社会史研究，已成为热门。如2002年的《抗癌的斗争：法国（1890—1940）》介绍了法国如何调动科学、慈善、伦理、社会、经济、政治力量来抵抗癌症；2005年的《希望的元素：镭与1900—1940年加拿大对癌症的反应》介绍镭治疗在加拿大癌症防治领域的应用；2010年的《医生、吸烟和福利国家：英国政府与癌症的斗争（1947—1957）》聚焦英国通过禁烟和提升公共卫生福利来防治癌症的十年；最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的《众病之王：癌症传》，回顾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癌症认知、防治，尤其详述了美国在该领域的成就，成为癌症史研究领域的巨著。在西方慢性疾病史研究中，身体史、观念史、日常生活史、物质文化史乃至环境史、全球史已经成为疾病史的应有之意。因此，亦有直接研究癌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即疾病的文化史研究。利奥波德的两部著作——《黑色丝带：二十世纪的乳腺癌、妇女和医生》《在雷达之下：癌症和

冷战》，剖析政府、企业和民众在关于乳腺癌的防治问题中是如何相互博弈，聚焦在乳腺癌防治中赋予女性的重要性。《谈判疾病：权力和癌症护理（1900—1950）》通过对大众观念和行为的分析，描绘了癌症患者对传统医学权威的挑战和对健康和治疗的理智选择，揭示出癌症患者、医生、立法者和政治家之间的冲突和斗争。此外，也有从观念史（《制造癌症史：在德克萨斯大学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疾病和发现》）、性别史（《乳腺癌战争》《女人的疾病：宫颈癌的历史》）、物质文化史（《紫杉醇的故事：抗癌药物研制过程中的自然和政治》《神奇子弹：一个微小橙色药丸如何重写癌症病史》《他莫昔芬与乳腺癌：不确定性的治疗管理》）等角度进行的研究。

2011年，学者王小军就指出中国疾病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即重视烈性疾病研究而忽视慢性疾病和地方性疾病的研究，重视成为灾害事件的疾病而忽视日常生活中的疾病研究。近年来，台湾史学界在肺结核、糖尿病等西方疾病史热门研究领域有所突破，特别在精神疾病研究领域，涌现出陈秀芬（关于金元明清时期精神疾病治疗的研究）、王文基（关于近代精神卫生医疗的研究）和巫毓荃（关于殖民医学中精神医疗的研究）等研究者的系列论文。而大陆历史学界也开始出现对于结核病、妇科疾病、癌症等疾病的医疗社会史研究。

当然，慢性疾病史研究要突破传统医学研究的藩篱，

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还要将医疗保障、医患关系、医学知识传播、病人体验、社会对疾病的认识和态度等纳入视野。近年来，《发现医病纠纷：民国医讼凸显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疾病、治疗与疼痛叙事——晚清日记中的医疗文化史》《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等研究成果成为本土化研究的新尝试。更重要的是，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我们需要反思20世纪以来的“卫生现代化迷思”，关注卫生现代化中的个人权利问题，例如过度医学化对身体的规训、健康权和生命权的提出等。这些恰恰都可以在慢性病研究中找到答案。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疾病史的未来发展，既然是要建立在下医学热点的基础上，那就一定要打破学科间的壁垒，强调内外史的合力。历史学者高晞认为，目前我国医疗史研究写出的是不懂“病”的“疾病史”和没有“卫生”的“卫生史”。这固然受限于医疗疾病史研究的跨学科特性，但也与部分历史研究者以“外史”为借口逃避对医学知识的学习有关。当下，中国正面临复杂的公共医疗卫生局面，疾病史研究者应以自己的研究更好地为现实需求服务，这就离不开与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以外史的视野、理论和方法，结合内史的专业化，中国疾病史研究才能前途光明。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